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王美艳*

内容提要 本研究利用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差异，考察了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总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 26%。其中，在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比上一代分别高出 33% 和 10%，而在人均教育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仅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 73%。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 14.9%，人均总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 10.9%；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均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更高，而教育消费占比更低。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消费弹性

一 引言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个群体的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显

*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my@cass.org.cn。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刘易斯转折期间的劳资关系治理”（批准号：714732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研究”（批准号：7164200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项目“《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的资助。

著不同的特征。本研究讨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进行比较，并且考察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户籍制度和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农民工的监测调查，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1.69亿人（国家统计局，2017）。迄今为止，从农村向城镇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部分代际更替。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中的最大群体。

已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年龄界定基本是一致的，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例如，“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王宗萍、段成荣，2010；杨菊华，2010；段成荣、马学阳，2011；彭仁贤，2011；沈蕾、田敬杰，2012；范婧，2014；黄晓燕、万国威，2016）。然而，各研究对农民工的统计口径和概念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王宗萍和段成荣（2010）考察了户口登记地不在本乡（镇、街道）、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而且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的两代农民工；杨菊华（2010）则考察了没有本地户籍的两代乡-城流动人口。

已有研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与比重有不同的统计结果。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34.6%（王宗萍、段成荣，2010）；在乡-城流动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36.9%（杨菊华，201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47%（段成荣、马学阳，2011）。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1.39亿人，在全部农民工中的占比为49.7%（国家统计局，2017）。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使用不同年份数据计算得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和比重不同自然是合理的，而且由于对农民工的统计口径和概念界定不完全相同，即便使用相同年份的数据，得到的结果也可能不同。此外，加上调查覆盖的地域不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比重的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也就成为必然。我们尝试寻找统计口径、概念界定和覆盖地域相同，从而具有较强可比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与比重统计，以便较为系统地观察该群体的变化趋势。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农民工的监测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到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成为外出农民工中最大的群体（“新生

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60.6%，数量达到1亿人（国家统计局，2014）^①。这是目前唯一的具有较强可比性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与比重的统计。

研究表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全新的人力资本与就业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参加过培训的比例更高；他们中有更高比例的人为独生子女；有更大比重的人在城镇长大和接受教育^②。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这些特殊特征，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和消费行为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蔡昉，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影响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消费状况，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农民工消费的代际差异对于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是有益的。

然而，系统地考察农民工消费代际差异的研究仍不多见。本研究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③，分析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使用这项调查数据主要有三点优势：第一，调查的抽样方法保证了样本对农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第二，调查数据中包含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等信息，满足本研究对数据的全部需求。其中消费状况是参照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的消费分类标准进行询问的，数据细致而且翔实。第三，该调查于2016年开展，能够提供关于农民工消费及其代际差异的最新信息。

本研究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述评；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并与上一代农民工进行比较；第四部分考察农民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讨论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消费的代际差异；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总结与述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

① 农民工包括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两个群体。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绝大多数年份仅公布全部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未对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做出单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和国家统计局（2014）中含有关于外出农民工数量和年龄结构的相关信息。

② 文章第二部分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详细评述。

③ 关于数据的详细介绍，请见文章第三部分。

水平更高(高颖,2008;杨菊华,2010;王宗萍、段成荣,2010)。“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段成荣、马学阳,2011;刘光辉、张建武,2011;李培林、田丰,2011;刘林平、王茁,2013)。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出1年(“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更高(高颖,2008)。“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0.6岁,远早于上一代农民工的33.7岁(“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是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懂农业生产,90%的新生代农民工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从就业的行业分布看,新生代和上一代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更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王宗萍、段成荣,2010)。“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段成荣、马学阳,2011;杨菊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段成荣、马学阳,2011;李培林、田丰,2011;刘林平、王茁,2013)。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刘林平和王茁(2013)均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与上一代农民工没有显著区别。何微微和邱黎源(2016)讨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因素,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黄晓燕和万国威(201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原生代农民工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石丹浙等(2014)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仍然不高。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收入的相对状况,研究结论不甚一致。有些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杨菊华,2010;刘林平、王茁,2013);另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收入高于上一代农民工(李培林、田丰,2011)。新生代农民工寄回、带回家的钱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比例为37.2%,远远低于上一代农民工(51.1%)(“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障的覆盖比例均较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王宗萍、段成荣,2010;段成荣、马学阳,2011),但其社会保障覆盖状况略好于上一代农民工(王宗萍、段成荣,2010;段成荣、马学阳,2011;杨菊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更进一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在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年龄、婚姻、学历和政治资本等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存

在显著影响（吴玉锋、张忠业，2015）。

迄今为止，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尚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大多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进行简单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更高一些；李培林和田丰（2011）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明显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刘林平和王茁（2013）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还有一些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某些消费类型进行了分析，例如金晓彤和崔宏静（2013）与金晓彤等（2015）对炫耀性消费，金晓彤等（2014）对教育型文化消费，以及金晓彤和杨潇（2016）对发展型消费的分析。然而，这些研究仅限于描述性分析，既未对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进行比较，也未深入考察其影响因素。

三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本部分首先对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进行介绍，既介绍调查的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也介绍调查包含的主要信息和权重使用。接下来详细阐述本研究对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是如何界定的。对农民工个体进行代际划分可较为直接地根据其出生年份，对农民工家庭进行代际划分则因家庭成员年龄的分散而略显复杂。本部分还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并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进行比较。

（一）数据介绍：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2016年6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6个城市开展了劳动力调查（以下简称“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抽样总体是城市主城区中所有居委会的常住人口，既包括本地户籍人口，也包括常住在这些居委会中的外来人口。

在每个城市，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抽选调查样本。第一阶段抽选居委会。在上海、广州、福州和武汉四个城市，采用与常住人口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简称PPS）抽样方法抽选居委会，在沈阳和西安，采用分层PPS抽样方法抽选居委会，“第二阶段是在抽中居委会内进一步抽选住宅。抽选住宅时，首先在抽中居委会内进行建筑物清查，整理建筑物列表，采用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选出一定数量的建筑物，然后对抽中建筑物内的所有住宅进行摸底，构建住宅抽样框资料，随后按照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选住宅。

在上海和广州，目标样本量均为1200户，其中本地户籍家庭700户，外来人口家

庭 500 户；在沈阳、福州、武汉和西安，目标样本量均为 1000 户，其中本地户籍家庭 600 户，外来人口家庭 400 户。最终上海的实际样本量为，本地户籍家庭 747 户，外来人口家庭 469 户；广州为本地户籍家庭 700 户，外来人口家庭 512 户；沈阳为本地户籍家庭 612 户，外来人口家庭 403 户；福州为本地户籍家庭 612 户，外来人口家庭 399 户；武汉为本地户籍家庭 608 户，外来人口家庭 414 户；西安为本地户籍家庭 608 户，外来人口家庭 377 户。

调查对象为抽中家庭中的全部人口和家庭成员的全部子女。本调查中包含的主要信息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家庭信息；一类是家庭成员个体信息。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住房情况、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和消费、最低生活保障等。家庭成员个体信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就业和收入、工作技能、工作环境、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时间安排和生活满意度等。

本研究将利用该调查中外来人口家庭的数据。调查中所包括的外来人口，有的为农业户口，有的为非农业户口，本研究只分析全部家庭成员均为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家庭，或称农民工家庭。最终用于分析的农民工家庭为 1378 个。本调查的抽样设计为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在分析数据时采用加权方式进行。由于在每一个城市以城市为总体，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抽选调查样本，因此，调查户数针对每一个城市单独计算，并且设计户数由抽选居委会的户数和抽选调查户的户数两部分相乘得到。

（二）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界定

本研究以家庭为单位考察农民工的消费，我们将农民工家庭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对农民工个体进行代际划分较为简单，可以直接根据其出生年份，将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归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 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则划归为上一代农民工。然而，由于家庭成员的年龄较为分散，对农民工家庭进行代际划分则略显复杂。

由于在学人口通常不对家庭的消费行为进行决策，我们对农民工家庭的分类根据家庭中不在学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进行。在一个家庭的不在学成员中，全部 16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均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的家庭，划归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全部家庭成员均出生于 1980 年之前的家庭，划归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还有一类家庭，其 16 岁及以上不在学成员中，有的成员出生于 1980 年以后，有的成员则是出生于 1980 年以前。对于这类家庭，如果其出生于 1980 年以后成员占 16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 50%，将其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小于 50% 则视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

(三)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 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农民工家庭在城市中进行其消费活动, 此处参照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中的消费分类标准, 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进行统计分析。在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中, 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共八类^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我们认为教育消费与文化娱乐消费的性质具有较大差异, 教育消费更大程度上带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而文化娱乐消费则不然, 因此, 本研究将教育消费与文化娱乐消费分开进行观察(表1)。还有, 我们将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归并为衣食住行消费。这样全部消费共划分为九个细类, 三个大类(分别为衣食住行消费、教育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

表1 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年人均消费水平比较

消费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1) (元)	上一代农民工家庭(2) (元)	(1) - (2) (元)	(1) / (2)
衣食住行消费	26738	20038	6700	1.33
食品	9527	7741	1786	1.23
衣着	1589	1087	502	1.46
居住	8173	6380	1793	1.28
生活用品及服务	680	450	230	1.51
交通通信	5621	3622	1999	1.55
文化娱乐	702	436	266	1.61
其他用品及服务	446	323	123	1.38
教育消费	1910	2611	-701	0.73
医疗保健消费	1340	1216	124	1.10
总消费	29987	23866	6121	1.26

资料来源: 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① 部分类型的消费在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明确的可分性, 能够以家庭成员个体为单位进行统计, 例如教育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还有一些类型的消费则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具有明确的可分性, 只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 例如食品消费。在本研究使用的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中, 教育和医疗保健消费是以家庭成员个人为单位进行统计的, 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 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的。此处, 在考察农民工的消费状况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为此, 我们需要将以家庭成员个体为单位统计的消费, 加总到家庭水平。

从总消费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消费为29987元,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为23866元,前者比后者高出6121元(26%)。分三大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衣食住行消费为26738元,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多出6700元(33%);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为1340元,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多出124元(10%)。与此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教育消费仅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73%。分细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食物、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均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其中,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高出的幅度均超过50%,文化娱乐消费高出的幅度更是超过60%。

(四)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看,分三大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高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4.82个百分点(表2)。与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消费所占比重,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低4.85个百分点。两代农民工家庭的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基本相当。分细类观察,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食物、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均更高。

表2 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比较

单位: %

消费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1)	上一代农民工家庭(2)	(1)-(2)
衣食住行消费	88.18	83.36	4.82
食品	35.15	34.86	0.29
衣着	5.15	4.74	0.41
居住	27.61	26.59	1.02
生活用品及服务	2.35	1.91	0.44
交通通信	14.87	12.54	2.33
文化娱乐	1.87	1.56	0.31
其他用品及服务	1.18	1.14	0.04
教育消费	7.46	12.31	-4.85
医疗保健消费	4.36	4.34	0.02
总消费	100	100	0.00

注:表中第二和第三列数字为各类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然而, 仅仅通过这些描述性信息, 我们尚无法清晰地识别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 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还受到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成员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和户主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下部分我们将运用实证分析模型, 考察农民工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四 农民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使用计量模型, 考察农民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分别进行回归, 考察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分析两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弹性; 然后将两代农民工家庭合并在一起, 考察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以及两代农民工的消费弹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部分还讨论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考察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 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模型的因变量为家庭年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首先被包括在模型中的是收入, 这是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家庭成员社会保障覆盖状况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也被包括在模型中。此外, 模型中还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以及城市虚拟变量。我们将使用的是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模型。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lnconpc = & \alpha + \beta \ln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iz e + \eta MEMBER \\ &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lnconpc 是指家庭年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 \lnincpc 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 \lnincpc 的系数 β 为消费弹性 (或称消费的收入弹性), ssp 是指家庭成员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hhsiz e$ 是指家庭规模, $MEMBER$ 是指一组反映家庭成员年龄结构的变量 (包括 6 岁及以下人口比例和 7 ~ 15 岁人口比例), $HEAD$ 是指一组户主特征变量 (包括户主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 $CITY$ 是指一组城市虚拟变量 (参照组为上海), u 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所用自变量见表 3。

表3 模型中所用自变量解释

自变量	类型	含义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连续变量	16岁及以上不在学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人口比例
家庭规模	连续变量	家庭人口数
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变量		
6岁及以下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6岁及以下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7~15岁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7~15岁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户主特征变量		
户主为女性	虚拟变量	户主为女性=1 户主为男性=0
户主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户主有配偶	虚拟变量	户主有配偶=1 户主无配偶=0
城市虚拟变量		
武汉	虚拟变量	武汉=1 其他=0
沈阳	虚拟变量	沈阳=1 其他=0
福州	虚拟变量	福州=1 其他=0
西安	虚拟变量	西安=1 其他=0
广州	虚拟变量	广州=1 其他=0

首先，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家庭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在回归中加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用以观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已经被很多研究所证实。此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收入水平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若干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能够促进消费（Feldstein，1974；Munnell，1974；张继海，2008）。我们在回归中加入养老保险覆盖比例^①，用以考察养老保障覆盖对消费的影响。不过，养老保险覆盖对家庭当前消费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对未来收入具有更加稳定的预期，可能增加当前消费；另一方面，参加养老保险会减少当前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可能减少消费。

再次，有关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年龄结构的变量也可能影响家庭的生活消费^②。回

①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或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均算作被养老保险覆盖。

② 家庭成员包括以下四类人员：过去12个月中共同居住了6个月及以上且共同开支的人；最近6个月内出生的人；最近6个月内因婚姻关系迁入本户的人；过去12个月中未在家居住6个月及以上，但仍由家庭供养的在学学生。

归方程中放入家庭规模是为了控制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回归方程中放入 6 岁及以下人口比例和 7~15 岁人口比例是为了控制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对某些消费类型的影响。例如，7~15 岁人口比例越高，家庭的人均教育消费可能越多。

然后，回归方程中加入一组可能影响消费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年龄是户主的重要个人特征，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划分就是依据家庭成员的年龄信息进行的，因此，回归方程中不再放入户主年龄，而只放入户主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

最后，回归方程中放入一组城市虚拟变量，分别为武汉、沈阳、福州、西安与广州，上海为参照组，旨在控制与地区相关的可能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如价格水平等。

表 4 是模型中所用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609 元，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为 30953 元，前者比后者高 38%。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养老保险覆盖比例为 55%，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61%）低 6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3.16 人，略小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3.18 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6 岁及以下人口比例平均为 14%，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 10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7~15 岁人口比例为 11%，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低 4 个百分点。

表 4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上一代农民工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2609	30953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55	0.61
家庭规模(人)	3.16	3.18
6岁及以下人口比例	0.14	0.04
7~15岁人口比例	0.11	0.15
户主为女性比例	0.20	0.15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10.97	8.95
户主有配偶比例	0.84	0.96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比例为 20%，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 5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97 年（大约相当于高中二年级），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95 年（略低于初中三年级），两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相差 2.02 年，差距较大。两代农民工家庭户主有配偶的比例均较高。

表5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我们将两代农民工家庭的样本分开,对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以及总消费分别进行了回归。各模型的因变量均为各类消费的自然对数。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符合预期。

表5 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衣食住行消费对数		教育消费对数		医疗保健消费对数		总消费对数	
	新生代	上一代	新生代	上一代	新生代	上一代	新生代	上一代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0.246 (5.59)***	0.187 (5.12)***	0.454 (1.73)*	0.092 (0.44)	0.005 (0.02)	0.274 (1.07)	0.248 (5.15)***	0.165 (4.71)***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073 (1.17)	-0.007 (0.11)	0.500 (1.67)*	0.572 (1.57)	0.109 (0.33)	0.514 (1.32)	0.112 (1.77)*	0.034 (0.54)
家庭规模	-0.186 (7.17)***	-0.178 (5.93)***	0.261 (1.34)	1.526 (7.68)***	0.406 (2.74)***	0.198 (1.09)	-0.153 (5.91)***	-0.113 (3.69)***
6岁及以下人口比例	-0.210 (0.92)	0.580 (1.70)*	9.409 (6.82)***	-1.951 (0.69)	-0.468 (0.43)	3.686 (1.91)*	-0.106 (0.47)	0.401 (1.14)
7~15岁人口比例	-0.564 (2.70)***	-0.101 (0.64)	15.005 (11.33)***	9.338 (9.41)***	-3.427 (2.98)***	-1.348 (1.20)	-0.361 (1.75)*	-0.042 (0.26)
户主为女性	0.023 (0.36)	-0.003 (0.05)	0.656 (1.85)*	0.647 (1.83)*	0.971 (3.06)***	-0.164 (0.33)	0.064 (1.01)	0.007 (0.12)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3 (0.36)	0.011 (1.29)	0.032 (0.61)	0.098 (1.76)*	0.048 (0.95)	-0.090 (1.40)	0.002 (0.24)	0.009 (1.18)
户主有配偶	0.012 (0.15)	-0.143 (1.06)	0.655 (1.81)*	-0.481 (0.66)	1.038 (2.19)***	-0.274 (0.37)	0.037 (0.47)	-0.149 (1.15)
城市虚拟变量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常数项	7.971 (17.04)***	8.289 (22.53)***	-5.536 (1.94)*	-1.837 (0.84)	3.301 (1.37)	2.962 (1.17)	7.935 (15.62)***	8.556 (23.64)***
R ²	0.46	0.28	0.51	0.49	0.09	0.06	0.38	0.19
观察值	781	597	781	597	781	597	781	597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城市虚拟变量均包括在模型中。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方程的因变量为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人均可支配收入自然对数的系数,实际上即为消费弹性。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分别为0.246和0.187;总消费弹性分别为0.248和0.165。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消费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上一代农民工的

教育消费弹性系数不显著。两代农民工的医疗保健消费弹性系数均不显著。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消费和总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规模对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和总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规模越大,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和总消费越少。换句话说,家庭规模对衣食住行消费和总消费均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例如,对新生代农民工衣食住行消费而言,家庭规模系数为-0.186,这意味着,家庭规模每增加1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减少18.6%。

6岁及以下人口比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也正向影响上一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7~15岁人口比例对两代农民工的教育消费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年龄段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在学校就读,其教育消费较多自然合理。7~15岁人口比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总消费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如果户主为女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家庭的教育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会更多;对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家庭的教育消费会更多。这表明,女性户主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健康更加关注。对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而言,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人均教育消费越多。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如果户主有配偶,则家庭的人均教育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都更多。

(二)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弹性差异

为了考察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混合在一起,在模型(1)中加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虚拟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家庭=1,上一代农民工家庭=0),进一步估计回归模型(OLS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ln conpc = & \alpha + \sigma new + \beta \ln incpc + \psi sp + \gamma hhsz + \eta MEMBER \\ &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end{aligned} \quad (2)$$

模型(2)中,*new*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均与模型(1)相同。再进一步,为了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弹性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在模型(2)中加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的交叉项(*new*lnincpc*),设定模型(3)。如果交叉项的系数 ω 显著,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弹性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差异。系数 ω 显著为正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弹性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系数 ω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弹性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ln\text{conpc} = \alpha + \sigma\text{new} + \beta\ln\text{incpc} + \omega\text{new}^* \ln\text{incpc} + \psi\text{ssp} + \gamma\text{hhsiz} \quad (3)$$

$$+ \eta\text{MEMBER} + \lambda\text{HEAD} + \phi\text{CITY} + u$$

表6为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混合样本,对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总消费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而且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符合预期。

表6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弹性差异 (OLS模型)

自变量	衣食住行消费对数		教育消费对数		医疗保健消费对数		总消费对数	
	模型(2)	模型(3)	模型(2)	模型(3)	模型(2)	模型(3)	模型(2)	模型(3)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0.149 (3.31)***	-0.828 (1.49)	-1.176 (4.12)***	-3.423 (1.06)	0.112 (0.39)	0.893 (0.28)	0.109 (2.35)**	-1.137 (2.03)**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0.225 (7.71)***	0.173 (4.78)***	0.232 (1.34)	0.113 (0.52)	0.141 (0.83)	0.182 (0.74)	0.214 (7.04)***	0.148 (4.36)***
交叉项		0.095 (1.77)*		0.220 (0.70)		-0.076 (0.25)		0.122 (2.24)**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032 (0.69)	0.032 (0.70)	0.534 (2.21)**	0.534 (2.21)**	0.318 (1.24)	0.318 (1.24)	0.072 (1.60)	0.073 (1.60)
家庭规模	-0.177 (8.92)***	-0.177 (8.96)***	0.793 (5.50)***	0.794 (5.52)***	0.317 (2.79)***	0.317 (2.79)***	-0.131 (6.57)***	-0.131 (6.60)***
6岁及以下人口比例	0.027 (0.15)	0.067 (0.37)	5.788 (4.68)***	5.881 (4.66)***	1.041 (1.12)	1.009 (1.08)	0.027 (0.16)	0.079 (0.45)
7~15岁人口比例	-0.291 (2.33)**	-0.267 (2.12)**	12.032 (14.92)***	12.087 (14.86)***	-2.509 (3.16)***	-2.528 (3.19)***	-0.174 (1.43)	-0.144 (1.16)
户主为女性	0.010 (0.21)	0.009 (0.19)	0.613 (2.20)**	0.610 (2.20)**	0.629 (2.28)**	0.630 (2.28)**	0.042 (0.87)	0.040 (0.8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10 (1.73)*	0.010 (1.63)	0.071 (1.89)*	0.070 (1.86)*	-0.011 (0.29)	-0.010 (0.28)	0.010 (1.58)	0.009 (1.46)
户主有配偶	-0.077 (1.17)	-0.071 (1.08)	0.399 (1.19)	0.413 (1.22)	0.618 (1.66)*	0.613 (1.64)	-0.060 (0.91)	-0.052 (0.80)
城市虚拟变量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常数项	7.924 (26.41)***	8.440 (23.10)***	-2.616 (1.45)	-1.429 (0.66)	2.691 (1.57)	2.278 (0.94)	8.068 (25.83)***	8.726 (25.26)***
R ²	0.42	0.43	0.49	0.49	0.06	0.06	0.34	0.34
观察值个数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注: 括号内为t值;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交叉项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的交叉项; 城市虚拟变量均包括在模型中。

资料来源: 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对模型(2)而言,本研究最关注的自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一虚拟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对人均衣食住行消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一变量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14.9%。对教育消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一变量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教育消费低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一变量对衣食住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教育消费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医疗保健消费没有影响。加总起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对衣食住行消费的影响程度高于对教育消费的影响程度,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一变量对人均总消费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总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10.9%。

对模型(3)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变量。对人均衣食住行消费和人均总消费而言,交叉项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均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消费弹性与医疗保健消费弹性,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没有显著差异。

(三)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差异

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我们看到,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我们还感兴趣的是,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我们估计了回归模型,模型的因变量为各类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因变量是介于0~1之间的变量,我们使用 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 进行估计,保证因变量的预测值也介于0~1之间(Wooldridge, 2002)。模型设定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模型对所有类型的消费均合适;第二,模型满足可加原则,即所有类型的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等于1。模型设定如下:

$$pconpc = \alpha + \sigma_{new} + \pi \lnconpc + \zeta \lnconpc^2 + \psi_{ssp} + \gamma_{hhsize} + \eta_{MEMBER} + \lambda_{HEAD} + \phi_{CITY} + u \quad (4)$$

其中, $pconpc$ 是指某类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 new 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虚拟变量, \lnconpc 是指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自然对数, \lnconpc^2 是指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自然对数的平方项。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含义均与模型(1)中变量的含义相同。表7为模型(4)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混合样本,对衣食住行消费、教育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分别进行了回归。

表 7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差异

	衣食住行消费占比	教育消费占比	医疗保健消费占比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0.385 (3.78) ***	-0.461 (3.27) ***	0.197 (0.54)
人均总消费对数	-1.101 (0.65)	4.022 (1.47)	1.955 (0.61)
人均总消费对数平方	0.041 (0.48)	-0.197 (1.45)	-0.053 (0.35)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219 (2.17) **	0.228 (1.73) *	0.249 (0.90)
家庭规模	-0.325 (7.07) ***	0.309 (5.75) ***	0.191 (1.31)
6 岁及以下人口比例	-0.415 (1.13)	0.436 (0.69)	-0.686 (0.66)
7~15 岁人口比例	-1.065 (4.19) ***	1.880 (5.65) ***	-1.468 (2.23) **
户主为女性	-0.278 (2.70) ***	0.309 (2.56) **	-0.111 (0.28)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12 (0.70)	0.011 (0.63)	-0.112 (2.24) **
户主有配偶	-0.526 (2.33) **	0.869 (2.85) ***	1.018 (1.20)
城市虚拟变量	包括	包括	包括
常数项	10.050 (1.19)	-24.779 (1.80) *	-17.719 (1.08)
观察值个数	1378	1378	1378

注：括号内为 z 值；***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城市虚拟变量均包括在模型中。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更高，而教育消费占比更低，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在两代农民工家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大部分符合预期，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例如，家庭规模越大，衣食住行消费占比越低；7~15 岁

人口比例越高，教育消费占比越高。这些结果都是符合常理的。此外，如果户主为女性，家庭教育消费占比更高，表明女性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王美艳，2012；De & Ratha，2005）。

五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差异，考察了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讨论了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消费弹性和消费结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部分将总结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从总消费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消费为 29987 元，上一代农民工家庭为 23866 元，前者比后者高出 6121 元（26%）。分三大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衣食住行消费为 26738 元，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多出 6700 元（33%）；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为 1340 元，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多出 124 元（10%）。与此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教育消费仅为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 73%。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新生代与上一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分别为 0.246 和 0.187；总消费弹性分别为 0.248 和 0.16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 14.9%，人均总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高出 10.9%。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均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更高，而教育消费占比更低。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为 49.7%，数量达到 1.39 亿人（国家统计局，2017）。进入 21 世纪以来，外出农民工的月收入持续增长，2001 - 2016 年期间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 9.6%。正如实证分析所表明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衣食住行消费与人均总消费均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衣食住行消费弹性和总消费弹性均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蔡昉(2011),《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第5-11页。
- 段成荣、马学阳(2011),《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人口与经济》第4期,第16-22页。
- 范婧(2014),《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第9期,第82-87页。
- 高颖(2008),《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及分析》,《人口研究》第5期,第83-90页。
- 国家统计局(201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2017),《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何微微、邱黎源(201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西北人口》第4期,第37-44页。
- 黄晓燕、万国威(2016),《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22-130页。
- 金晓彤、崔宏静(201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第104-110页。
- 金晓彤、崔宏静、韩成(2015),《“金玉其外”的消费选择背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炫耀性消费解析》,《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第106-110页。
- 金晓彤、崔宏静、李茉(2014),《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农业技术经济》第9期,第79-88页。
- 金晓彤、杨潇(2016),《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第13-22页。
- 李培林、田丰(2011),《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第3期,第1-23页。
- 刘光辉、张建武(201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

- 业调查数据》,《宏观经济研究》第11期,第99-104页。
- 刘林平、王茁(2013),《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136-150页。
- 彭仁贤(2011),《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述评》,《经济问题探索》第4期,第142-145页。
- 沈蕾、田敬杰(2012),《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结构分析》,《消费经济》第4期,第48-52页。
- 石丹浙、赖德胜、李宏兵(2014),《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经纬》第3期,第31-36页。
- 王美艳(2012),《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来自江苏和安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第1期,第93-101页。
- 王宗萍、段成荣(2010),《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第39-44页。
- 吴玉锋、张忠业(2015),《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6期,第15-22页。
-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7页。
- 杨菊华(2010),《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人口研究》第2期,第44-53页。
- 张继海(2008),《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De, Prabal & Dilip Ratha (2005). *Remittance Income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Sri Lanka Integrated Household Surve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Feldstein, Martin (1974).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5), 905-926.
- Munnell, Alicia (1974).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Personal Savings*.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 Wooldridge, Jeffrey (2002).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Compared with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Wang Meiy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s upon the data of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of 2016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new and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and examine factors that affect migrants' consumption.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otal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s 26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 among which the basic consumption (including food , clothing , residence , household facilities , articles and services ,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culture and recreation , miscellaneous goods and services) per capita is 33 percent higher and the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s 10 percent higher. Meanwhile , the education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only accounts for 73 percent of that of the old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 the basic consumption per capita and the total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s 14.9 percent and 10.9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respectively , after controlling other factors. The elasticity of the basic consumption and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Furthermore , the proportion of the basic consumption in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s higher while that of education consumption is lower.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 consumption level , consumption structure , consumption elasticity

JEL Classification: D12 , J01 , J10

(责任编辑: 王永洁)